

图腾文化

主编 江伟

蓝天出版社

中华文化史集萃 (37)

图 腾 文 化

陈东方 编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史集萃/江伟主编. —北京:蓝天出版社, 1998. 5

ISBN 7-80081-820-9

I. 中… II. 江…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177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64 $\frac{3}{8}$ 印张 3757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定价:286.00 元(全套 60 本)

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历代炎黄子孙勤劳和智慧结晶,是中华先民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继承并发扬优秀的古文化,让它们服务于今天的社会,是当代国人,尤其是青少年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华文化史集萃》丛书,从各个方面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在范围选择上,注意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使之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面貌。我们力求用通俗平实的语言把各种文化现象,文化事物的来龙去脉,历史发展,当前状况等,作比较系统的介绍,使之尽可能清晰、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注重实用性和借鉴性。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帮助广大读者有效地继承中华文化,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由于水平有限,其中不乏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一	石器时代的图腾文化·····	1
二	古代民族的图腾文化·····	12
三	近现代民族的图腾文化·····	29
四	图腾文化与萨满教·····	48
	(一) 萨满教的产生·····	48
	(二) 萨满·····	61
	(三) 神器·····	75
	(四) 祭祀·····	86
	(五) 人类原始文化的化石·····	107

一 石器时代的图腾文化

对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来说，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和文化事件，固已荒邈难稽，但历史的绵延不辍总是激起人们那种难以抑制的读解冲动。

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判断，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颇为丰沛，而且自成格局。其中，早期遗存以西侯度文化、元谋人文化、蓝田人文化、北京人文化和观音洞文化为代表；中期遗存以丁村文化为代表；晚期遗存以峙峪文化和山顶洞文化等为代表。

我们已经知道，就世界范围而言，40 万年前到 25 ~ 20 万年前是原初性图腾观念发生的时代，其后必穿越了一个漫长的发展、繁荣和衰微的时期。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直至晚期尽管尚未发现像欧洲旧石器时代那样较为确凿的图腾文化遗迹，但我们却不能据此就否定中国旧石器时代存在过一个发达的图腾文化时期的可能性。实际上，人类智力原理的一致性这一观念被许多学者所信奉。如果这

一观念尚可接受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那些处于相同生存情境和文化阶段上的人类经验，其成果也基本相同。如此看来，史前人类在图腾发生的智能机制上也具有普同性这一说法，似乎是可以成立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莫菲所言：“人类共同心理的相似活动……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地球上的许多彼此远离的地方和互不交往的人群当中，都会出现像图腾崇拜、外婚制……那些信仰和制度。”因此，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恐怕也应该有过一个原初性图腾观念的发生时期，以及它的累世不断的演变轨迹，只是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现和某些旁参互证性的复现工作来明定罢了。

曾有学者推想，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那里存在着图腾崇拜的事象，其根据是：在该遗址中发现一种绘有简单图案并被人工着色的小砾石与澳大利亚土著的图腾圣物“丘林加”（churinga）相似。从世界性的图腾文化的发生史来看，推想在山顶洞人的生活世界里有图腾观念的存在，这在理论上并不为过，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只是以旧式图腾论的理论框架为视点，然后在史前考古学中抽举一些事实性材料与近现代原始民族的图腾文化现象进行一番以类相从的解说，那么，这

基本上还是一种现象层次的直观描述，其理论解释的脆弱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做法至少越过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前提：石器时代的史前人类与近现代原始民族处于不同的生存情境之中，我们何以能够直接以后者的图腾文化现象来还原前者的图腾观念呢？这就说明，一方面以往的图腾理论尚需渐臻完备，以便提高理论本身的阐释力，另一方面，中国图腾文化的阐释要想在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轨道上运行不辍，还有待于实际操作的进一步精细化。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但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石器时代的中國图腾文化终于走出了渺然无踪的境况，可供我们领会的考古遗迹相当可观，呈现出一派瑰伟奇谲的气象。兹择其要，分为叙述。

在西安半坡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是中国考古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的一处原始氏族公社的聚落遗址，据¹⁴C测定，该遗址距今大约6700—6100年。据考古学家们推测，当时的社会亲族制度很可能还是母系，半坡先民是原始宗教的狂热信奉者，“虔诚地崇拜作为氏族标志的图腾”。他们在砖红色的陶器上绘制各种动物图案，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绘制在陶盆内的人面鱼纹，在这些入面鱼纹中，鱼形

图案不仅数量最丰，而且颇有变化，显得简而有体。难怪有学者甚至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以人面纹、鱼纹和变体鱼纹为特征的文化类型。由于这些鱼纹图案以抽象化和符号化的几何造型出现，使得这些象征性的鱼纹图案超越了现实的形态，富于神圣的意味。鉴于此，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似乎都倾向于鱼图腾是半坡氏族的标志这样一种解释，“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可能就是半坡图腾崇拜的徽号”，“即氏族的徽号”。但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并对那种简单地套用图腾理论去诠释中国古代文化的模式化操作表示不满，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质疑性意见。应该说，如果只是满足于那个笼统的旧式图腾理论，的确难以廓清半坡彩陶鱼纹的确切涵义。在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数百件石网坠、制作精美而又锋利的骨鱼叉和精巧的鱼钓钩，这些捕鱼工具表明在半坡先民那里有吃鱼的事实，这样的事实自然使《西安半坡》有关编者认为半坡的彩陶鱼纹是“人们为祈求取得更大量的生产物的欲望而以图画表示自己的心意”，但同时又声称作为食物的鱼等动物还是图腾，可以“作为图腾崇拜对象来解释”，如此一来，岂不把自己置身于有关图腾与禁忌的理论矛盾中去了吗？其实，这一矛盾

他们是意识到的：“查看半坡人的图腾史，一方面是以鱼为图腾，并使之人格化（人神化）；另一方面捕食鱼类仍是半坡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半坡人就是在这种图腾崇拜的矛盾中生活，并走向更高级的文明。”原来，半坡人本身就生活在图腾崇拜的矛盾中。这一解释似乎比从前的解释巧妙了一点，看起来好像还能消解有关图腾与禁忌的理论矛盾，但还是有捉襟见肘之嫌。

这种从经济角度来阐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图腾文化，在近些年来的中国学术界似乎成了某种惯例性的理论举止，很有代表性。实际上，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学者马尔、布伊哥夫斯基等人就试图从经济角度解释图腾的起源及其内涵，曾提出原始人类为了当地的动植物和生产工具固定化，形成了猎取专一种类的动植物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与专门猎取的动植物名称相联系，也就产生了图腾名称，它是“动植物与人类之无境界的生产意识化的表现而已”。图腾制就是具有切实的经济意义的社会结构，同时又是“原始共同制”到氏族制必不可少的产物。当社会进化到氏族制社会以后，图腾制“只是作为转形变质的部分的残留，成为创造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当时，我国学者岑家梧先生也

主此说，并在《转形期的图腾文化》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在这种说法中，图腾先于氏族发生的观点，可以说是较为切实的，只要比照一下我们在本书引言中作出的有关论说就可以明了个中道理，然而，关于图腾制中图腾物为现实的狩猎者的狩猎对象物”的说法，则显然有解释不通之处，如老虎之类的猛兽、蚱蜢之类的昆虫、各种小鸟等从来不会成为某一生产团体的专门猎取的对象物，也并不具有多少经济上的职能，但它们同样成为一些原始部落的图腾物种。事实上，从发生学的眼光来看，狩猎活动本身只是为图腾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图腾的发生还需要史前人类的心智水平、自然与文化动机等诸如此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条件和原因。至于把图腾的内涵界定为“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的社会结构”，也不免过于简单了些。

因此，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阐释包括半坡彩陶鱼纹在内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图腾文化内涵，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论困境，其关键恐怕就在于旧式图腾论在理论构架上缺乏健全的图腾发生学理论，以及对图腾基本内涵问题的较为切实的界定。

目前，我们大致上已经知道 40 万年前到 25—

20 万年前是图腾意识发生的时代，从考古学证据来看，图腾至少在 25—20 万年前就已发生，新石器时代已经是图腾文化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正因为如此，像半坡彩陶鱼纹的图腾涵义恐怕已只是原初性图腾观念兴盛期的一种遥远的记忆，寄寓其中的或许已只是图腾标志或图徽这一基本内涵，至于图腾禁忌这种行为化的活动内涵在当时大致上已大为淡化或已基本消歇，即使还存在图腾禁忌的习俗，也不甚规范和严格了。换句话说，在半坡人的心灵视像中留存下来的是原初性图腾观念特征之后的某些观念性的余绪。这样，旧式图腾论中所谓“图腾与禁忌”的理论症结也就基本上可以打开了。而所谓“特化”，意指特异化、专门化，这就意味着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所反映出来的图腾观念，很可能是已经特化了的某种观念形态，甚或杂揉着其它的意见和观念，如半坡型遗址中那些人面纹、鱼纹和蛙纹等图像的彩陶盆大多覆盖在婴儿瓮棺的上面，即是明证，这其中除特化了的图腾观念本身之外，尚有特定的巫术观念和灵魂观念等含摄在里面，或者说，这些特定的巫术观念和灵魂观念大约也是图腾观念的特化形态。有鉴于此，我们不难领会，在阐释半坡彩陶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样式

时，那个被大多数学者所惯用的、来自近现代民族学的图腾理论，其阐释的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把这个理论钢盔不加审检地裹携到史前文化的研究领地，恐怕既不能给研究者增加多少安全感，也不能在理论上提供令人舒心的润滑感。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引起特别注意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加上后文还要述及的“图腾特化”原理，在这种情景下再来审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其它考古遗迹，领会其中的图腾涵义，许多潜藏着谜意的文化事件，就显得清朗了许多。平衡视之，有关考古遗迹中的许多动物纹样或象征性的动物图像似乎都有着相类似的图腾意蕴，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中，有蛙纹、鸟纹、变形鸟纹、人面蜥蜴纹等；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绘有人面鱼纹、鱼蛙纹、鱼鸟纹、五鱼纹等，其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盆上，把双鱼和蛙对称性地同绘在一个彩陶盆里，有意识地把双鱼和蛙的形象进行了夸张，笔法简炼，形象生动；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主要有蛙纹和鸟纹，以及由它们演化而来的各种象征性纹样。

近几十年来，仰韶文化遗址内这种同类母题不断被发现，对鱼纹、蛙纹和人面纹等象征性的彩陶

图像，有关学者对此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说。如何在令人惶惑的各色各样的答案中超拔出来，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认可这些同类母题中所蕴含的图腾含义主要是氏族标志或图徽，是可以成立的。很显然，问题还不止如此，如，半坡彩陶上的动物纹样除鱼纹之外，还有鸟纹、鹿纹等。这种情状很自然地会使人们做出这样的推断：鱼是半坡人的氏族图腾，而鸟和鹿等则可能是家族图腾或个人图腾。这样的推断显然奠基在民族学的理论视野内，以民族学材料来印证，是一个较为合适的解释，但问题在于这种印证本身到底合理到什么程度？这恐怕就是一个永久性的难题了。另外，在临潼姜寨出土的一件彩陶盆上，双鱼和蛙对称性地同绘在一个彩陶盆里，如果鱼是氏族的图腾标志，那么蛙又是什么呢？诸如此类的鱼蛙并置或鱼鸟并置的图像，该作何解释呢？有学者以近现代土著民族中图腾文化现象来比照，确认那是一个氏族或家族同时崇仰两个图腾，推断姜寨彩陶上的鱼蛙纹和鱼鸟纹，表明彩陶的主人是崇奉两个图腾的，从这些彩陶都有鱼纹来看，说明鱼是他们的共同图腾，而蛙和鸟则是他们各自的图腾。这样的推断是不奇怪的。同样，我们似乎也可以提出另外一种解释。此

前我们曾有过理论上的论证，并且认为：在图腾与氏族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图腾获得了祖先模像的内涵；在两合氏族的婚姻联盟组织中，两个氏族的图腾名称就获得了祖先合婚模像的内涵。无论是单一氏族图腾的祖先模像，还是两合氏族图腾的祖先合婚模像，都是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氏族或两合氏族成员的头脑中。两合氏族图腾的祖先合婚模像这一基本内涵，是否意味着仰韶文化遗址中那些鱼蛙并置或鱼鸟并置等象征性图像，很可能就是两个彼此婚配的鱼氏族与蛙氏族、或者鱼氏族与鸟氏族所组成的两合氏族婚姻联盟中图腾祖先合婚模像的艺术表现呢？尽管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仰韶文化的两合氏族组织处在何种发展阶段上。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还有一些考古材料也往往在图腾含义上得到了解释，如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墓葬中，首次发掘出了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像，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和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牛河梁“女神庙”与积石冢等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不少龙形玉器和猪龙塑像，在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许多鸟形雕塑，如此等等。这些图腾遗迹，我们将在下文有关篇幅里作出阐说，在此就难以尽述了。

1987年5月18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后洼遗址出土40多件原始图腾石雕和人形陶像》的报道。该遗址位于辽东半岛黄海沿岸,据测定,这是一处距今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它的下层文化中挖掘出了众多的动物石雕,有龙、虎、猪、狗、鸡、鹅、鹰、蝉、鸟、昆虫、鱼等,造型生动,形象刻画入微有致。对这批出土文物的性质,有的专家认为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图腾石雕。这一推断,似乎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和宣传。不过,这些动物形象,是否可以在图腾的意蕴上去读解,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还需要一些相关的、强有力的文化情境分析才行,不能只是在现象层次上进行直观性的推演。